

物質結構對上理念結構：五代十國體系 穩定的歷史案例研究及其理論啓示

楊仕樂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

摘 要

本文嘗試延伸物質與理念結構競爭解釋的經驗證據範疇，以爲當代國際關係中對於體系穩定的理論研究產生啓示。接續針對春秋戰國時代的研究之後，本文聚焦在中國史上另一段類似歐洲多國並列的五代十國時期，本文先考察判定期間的物質結構變化，並探究當時流行的主流理念，再對應期間戰爭與和平的起伏，進行競爭性解釋的比對。從中本文發現，導致穩定的物質結構作用壓倒了導致衝突的理念結構作用，兩極體系較穩定的論點，反而在五代十國時期獲得了支持。

關鍵詞：兩極、多極、物質結構、理念結構、五代十國

壹、前言

俄烏戰爭的爆發，似乎再次肯定了多極體系的不穩定，不禁令人想起早在冷戰結束之初，知名的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學家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所預言，美蘇兩極體系的瓦解將導致歐洲「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也就是近 500 年歐洲多極競爭

經驗的重現與延續（Mearsheimer, 1990: 5-56）。¹ 然而，俄烏戰爭從醞釀到最終爆發的過程，其實根本與其所主張多極體系導致不穩定所依據的權力平衡邏輯相違背。蘇聯瓦解雖然使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分崩離析，但沒有導致美國領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也隨之終結，反倒讓較強的一方變得更強、吸引更多東歐國家加入。如同邁爾斯（Simon Miles）所說，東歐國家在冷戰結束之時，並不是被強權間的外在物質結構所驅使，而是有自己的能動性，決定徹底毀滅華沙公約組織、脫離蘇聯、與西方結盟，並將剩下的俄國排除在歐洲安全體制之外（Miles, 2024: 51-85）。同樣的道理，烏克蘭也沒有如現實主義者所預期，以自身廣大的領土人口與紮實的軍工產業為基礎，保留核武並戮力尋求強權地位（Mearsheimer, 1993: 50-66），反而自願做一個從屬性的小國。烏克蘭在 2014 年「廣場革命」後，認同西方的價值、有脫俄入歐的渴望，這不僅是這次戰爭爆發決定性的因素，歐洲各國竟也聯手協助烏克蘭，抵禦其實並不那麼強大的俄國，也可說是某種歐洲集體認同的反映（Ploky, 2023: 15-18; Bengtsson, 2024: 31-48）。換言之，歷來現實主義傳統下所主張物質結構主宰的觀點，又再度受到建構主義所強調理念結構的挑戰。

就此而言，俄烏戰爭爆發迄今儘管有許多相關的理論性研究，譬如探討戰爭對國際關係的影響（Vlados & Chatzinikolaou, 2024: 91-113; Kurnyshova, 2023, 6-8）、對核子嚇阻與危機穩定的啟示（Freedman, 2023: 7-36; Evangelista, 2024: 7-50; Talmadge et al.,

1. 米爾斯海默對權力結構採取區域性的觀點，故而歐洲在冷戰後形成多極體系，他所談的穩定與不穩定變動也是限於歐洲範圍之內，不考慮歐洲以外其他區域的代理人戰爭，而本文也採取此區域性觀點。至於認為當今世界是美中兩極體系的觀點，請見琳德（Jennifer Lind）（2024: 7-55）。

2024: 7-46)、美國對歐洲的延伸嚇阻 (Goldgeier & Wojtowicz, 2022: 736-743)、無人機對攻守平衡的影響 (Calcara et al., 2022: 791-825)、民族主義與國際衝突 (Cederman et al., 2024: 259-292)、性別政治與戰爭 (Damann et al., 2024: 321-340)、輿論與使用武力 (Aksoy et al., 2024: 341-360), 或是威權主義與戰爭的關係 (Ferraro, 2024: 170-191; Hale & Lenton, 2024: 9-50; Røren, 2023: 7-49), 卻沒有相關研究去探討「極」、戰爭、物質與理念結構競爭解釋等更宏觀的基礎國際政治理論議題。也許, 一如當代國際政治理論宗師華茲 (Kenneth N. Waltz) 所說, 「國際政治中如果有任何理論, 那就是權力平衡理論」 (if there is any distinctively politic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ance of power is it) (Waltz, 1979: 117), 儘管從權力平衡角度所推導多極導致不穩定的論述, 的確無法解釋俄烏戰爭的爆發與後續, 但這在華茲看來可能只不過是近 500 年歐洲歷史經驗中的少數例外情形, 不足以對他通論性的理論構成根本威脅。然而, 在更大的時空範圍內, 理念結構是否能夠成爲一種有力的競爭解釋, 甚至壓倒兩極或多極物質結構下權力平衡的邏輯? 已有研究另從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紀錄中發現, 雖然導致穩定的理念結構, 的確是無法壓倒導致不穩定的物質結構, 但導致不穩定的理念結構效力, 卻可壓倒導致穩定的物質結構效力。兩極的春秋末年其實比多極的春秋早期更不穩定, 因爲此時禮樂已日益崩壞, 而各國都信奉「富國強兵」, 這般理念邏輯壓倒物質邏輯的情形持續達 216 年之久, 只有短短 44 年的時間才是導致不穩定的多極物質結構, 壓倒「尊王攘夷」這樣導致穩定的理念結構 (楊仕樂, 2024: 89-182)。

那麼, 在中國其他的歷史朝代中, 是否也可以獲得類似的論據, 進一步肯定理念結構的重要性呢? 理念結構是否就一定壓倒物質結構的效力呢? 本文嘗試延伸此一物質與理念結構競爭解釋的經驗證據範疇, 以爲當代國際關係中對於體系穩定的理論研究產生啟示。本文聚焦在中國史上另一段類似歐洲多國並列的五代十國時期 (907-

979)，先考察判定期間的物質結構變化，並探究當時流行的主流理念，再對應期間戰爭與和平的起伏，進行競爭性解釋力的比對。從中本文發現，戰亂頻仍的五代十國時期，爭權奪利、無視信義的普遍觀念雖然持續流行，但體系穩定的起伏卻隨著權力分配結構的變化而改變。意即，導致穩定的物質結構作用壓倒了導致衝突的理念結構作用，兩極體系較穩定的論點，反而在五代十國時期獲得了支持。

貳、文獻探討

關於兩極／多極的物質結構如何影響體系的穩定，多年來已經有相當豐富的研討，並在多極之下再進一步細分成三種不同的權力分配結構。本來，華茲提倡兩極體系較穩定，是因為體系中僅有的兩個強權彼此抵制，最容易形成權力平衡，不會有多極體系中推諉或串聯的平衡困難（Waltz, 1964: 881-909）。華茲的論述套用在冷戰時，發生了兩大強權與兩大集團的混淆，這一個缺失經過華格納（R. Harrison Wagner）的修正，指出冷戰時歐洲大陸上形成穩定的權力平衡，其實是因為在多個強權中蘇聯特別強大，且到了接近主宰的地位，而引起其他英法德義等歐洲強權聯合抵制（Wagner, 1993: 76-106）。²由此，歐洲就算是多極體系，何以體系的穩定仍有巨大的起伏？米爾斯海默提出了「不平衡多極體系」（unbalanced multipolarity）的概念（Mearsheimer, 2001: 344-347），也就是多極中雖有一強權特別強大，但又還未達前述蘇聯近乎主宰的程度時，其雖易於發動擴張，但他國還是有推諉的空間，遂導致權力平衡不能即時有效，而引發最嚴重的戰爭，譬如拿破崙時代的法國、20 世紀初的德國（請見表 1）。

2. 換言之，雖然世人習於稱冷戰為美蘇的兩極體系，但華格納獨排眾議，主張當時歐洲並非兩極體系。

表 1 「極」的不同狀態與體系穩定

「極」的狀態		穩定程度	提倡者	本文用語
兩極		最穩定	華茲	兩極
多極	多極中有近主宰強權	穩定	華格納	一超型多極
	多極	不穩定	華茲	多極
	不平衡多極	最不穩定	米爾斯海默	一強型多極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上述演進雖足以解釋過去的歐洲，但從冷戰結束以來的局勢乃至近期俄烏戰爭的爆發，卻難以適用。本來，蘇聯瓦解不再是近乎主宰的強權，其他強權就不會團結予以抵制，而是利用多極體系不易形成權力平衡的結構特性，伺機擴大自己的權力，使歐洲重回以往多極競爭的態勢，這也是米爾斯海默當時為何會用「回到未來」為標題。只不過，後來局勢的發展，歐洲各強不但持續結盟在北約之下，還進一步向東擴大，根本違背了權力平衡的邏輯。乍看之下，俄烏戰爭這場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歐洲最大規模戰爭的爆發，似乎應驗了理論的預期不是不對，只是時候未到（Waltz, 2000: 5-41），³但細究其過程卻依然不符合原有理論的推論。如果說蘇聯解體後俄國的經濟後來漸漸從谷底回升，然其損失了原有的加盟共和國與原來形同殖民地的東歐附庸國，再如何復原也無法重回近主宰的地位，頂多只是多極歐洲中相對最強的一國，如此則當俄國入侵烏克蘭時，應該會看到歐洲各強仍是推諉優先，但他們的反應卻又不是如此。

俄國於 2014 年兼併克里米亞與烏克蘭東部，歐洲強權提出《明斯克協議》（*Minsk Agreement*）當作緩兵之計（Freedman, 2014: 7-38），看起來很像是二次大戰前慕尼黑會議的翻版，但若當時波蘭遭到德國入侵後，英、法、蘇仍然不團結，甚至還趁火打劫，這才是

3. 時候未到，其實也正是華茲當年面對理論失準的質疑時所採取的回應。

不平衡多極體系下的寫照。然俄烏戰爭爆發後，歐洲各強卻是冷戰結束以來從未有的團結一致。雖說其中可能有一定的應付成分，譬如德國、法國等強權的軍備提升幅度，甚至還遠不如本來算不上強權的波蘭（Jones, 2023），但包括德國在內的許多歐洲國家，確實是不惜傷害自身經濟而大幅減少進口俄國油氣（Ruhnau et al., 2023: 621-628; Stent, 2022: 27-38），相形之下，印度乘機漁利的做法才符合預期（Iqbal & Rahman, 2023: 159），兩者的反差十分鮮明。歐洲對俄國的抵制，顯然也不是因為俄國戰力強大使歐洲各強警覺所致，畢竟俄軍裝備陳舊、戰備不足，暴露出俄國國力的弱點，不但遠遠未達接近主宰的程度，甚至連使歐洲成為不平衡多極的程度都還不夠，從結構上仍是促使歐洲各強推諉抗衡的責任。

俄烏戰爭前後，這些不符合現實主義物質結構下權力平衡邏輯的現象，在建構主義所談的理念結構下來看，卻一點也不奇怪（Rathbun & Pomeroy, 2022: 656-689）。如同霍迪楚克（Olha Hordiichuk）所說，俄烏戰爭其實是東方與西方的對抗（Hordiichuk, 2023: 4-23），若以代表性的建構主義學者溫特（Alexander E. Wendt）的論述來說，至少對歐洲各個強權而言，無政府文化（Culture of Anarchy）已經脫離「霍布斯式」（Hobbesian），進入「洛克式」（Lockean），並向「康德式」（Kantian）過渡（Wendt, 1999: 246-312）。2014 年廣場革命後，烏克蘭想要加入西方，而俄國則不在西方的範圍內。當然，就算俄烏戰爭並非原有理論預期的應驗，如同前文所述，現實主義也不認為這會是根本的挑戰。華茲此前即強調，他的理論是總體性宏觀的國際政治理論，不是針對個案的外交政策理論（Waltz, 1996: 54-57），米爾斯海默也指出，再好的理論也會有例外（Mearsheimer, 2014: 77-89）。然而，在更大的時空範圍內，理念結構是否能夠成為一種有力的競爭解釋，甚至壓倒兩極或多極的物質結構邏輯？

當然，各時代的主流理念未必相同，也未必能直接套用溫特的三

種無政府文化類別。某個時代究竟流行哪種理念、該種理念是導致體系穩定或不穩定，都只能從該時代的歷史紀錄中歸納得出，無法像物質結構能直接以「極」的狀態作完整的演繹推論。就此而言，既有的研究已另從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經歷中發現，雖然導致穩定的「尊王攘夷」理念結構，無法壓倒導致不穩定的「一強型多極」物質結構；但導致不穩定的「富國強兵」理念結構，正可壓倒導致穩定的「兩極」與「一超型多極」物質結構。筆者在 2024 年的研究，首先承接了既有研究的基礎，在兩極體系導致穩定之外，另將華格納近主宰地位強權引起抗衡聯盟的觀點稱之為「一超型多極」；米爾斯海默潛在區域霸權特別導致不穩定的不平衡多極體稱為「一強型多極」（楊仕樂，2024：96-97），⁴再套用到古代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戰爭與和平，檢視物質結構與理念結構的競爭解釋效力。結果發現，春秋早期的多極體系確實導致不穩定，接下來五霸開始出現，使體系進入一強型多極態勢，雖然此時流行起「尊王攘夷」的觀念，但此一理念結構不敵物質結構的解釋，因而使戰爭變得更頻繁也更激烈。只是，隨後進入晉、楚兩強對抗的兩極狀態，然而體系並沒有隨之漸趨穩定，反倒是「富國強兵」理念的流行，解釋了持續的不穩定。隨後的戰國時代也是如此，秦國從七雄中慢慢脫穎而出取得近主宰的地位，體系從一強型多極進入一超型多極，但這樣的物質結構也沒有導致如同北約團結對抗蘇聯的態勢，持續的「富國強兵」理念解釋了體系為何變得更加不穩定（楊仕樂，2024：100-114）。

這樣的成果，可謂是學界首次系統化以國際政治理論的角度，來

4.「一『超』型多極」、「一『強』型多極」雖然都是「多極體系」中有一個「特別強大」的強權，但兩者的區別在於，一「超」比一「強」還要更強。一「超」型多極中，稱為「超」的首強，其強大程度能與其他各極總合相等，並能自力對抗其他各極的聯合，如前述冷戰時期的蘇聯；但一「強」型多極中，稱為「強」的首強，其強大程度則遜於其他各極的總合，無法自力對抗其他各極的聯合，如 20 世紀前半的德國。

研究整個春秋戰國全期的體系穩定，跨出了近 500 年歐洲的時空範圍，也呈現了理念結構壓倒物質結構，絕非只是一時偶爾的例外。於是乎，邏輯上的下一步，自然就是運用相同的方法與模式，對中國歷史上另外一段與歐洲多國並列情形相似，但鮮少被提及的五代十國時期，進行類似競爭性解釋的對比。於此，不僅國際關係學界迄今並無針對五代十國全期體系穩定變化的國際政治理論研究，就連個案的考察都十分罕見（李揚帆，2015：40）；甚至歷史學界對這個時代戰爭的研究也很少，主要是戰術戰法與戰鬥經過，或是軍文關係的作品（關榮勻，2017：89-119；2021：1-172；朱增泉，2011：103-129；曾國富，2018：46-52；穆靜，2010a：55-62；2010b：63-69），歷史學界應頗為熱衷的社會經濟研究亦不多見（盧胡彬，1999：433-438；李宗翰，2023：45-85；韓啓超，2024：45-85；牟錫川、王旭烽，2024：59-66）。近期較著名如王賡武的研究，也只是關注於五代君主如何勵精圖治，十國方面則未著墨（Wang, 2007: 1-224）。細節史料的缺乏固然是最根本的限制（杜文玉，2011：序 2），但若以國際政治理論所採取的宏觀概略視角，五代十國留存的史書記載，仍是足以進行與春秋戰國時期相同樣式的研究。

至於針對五代十國主流的思想研究，也極度罕見。國史宗師錢穆就痛批，篡逆氾濫的五代十國時期，是中國的「黑暗時代」（錢穆，1995：493），當時已算最上軌道的政治實體，反而是契丹人建立的遼國，「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得盡習漢風。」「法令簡易，科役不煩，遂使一時民眾絕其南顧之念。」（錢穆，1995：520-522）相對「北方的中國已經到了最不像樣的時代，而南方……還有一個樣子……」（錢穆，1995：502）但整體而言只能說是道德淪喪、唯利是圖，根本無從以忠孝節義評論當時人物（錢穆，1995：519）。如果五代十國時的主流理念是如此不顧道德、不講信義，那應該會導致體系不穩定。畢竟，權力平衡的邏輯是要求弱者聯合對抗強者，但主流理念若認為弱者趨炎附勢、叛變投靠強者並不會不光彩、不須有

什麼道德或心理負擔，那就會促成國際關係理論上所稱的「依附／扈從」（bandwagoning），將促使體系不穩定。五代十國的主流理念是否真是如此？實證資料如何？仍有待探索。

參、研究架構與各階段發現

有鑑於既有研究的缺口與延續性起見，本文將對五代十國時代展開考察。第一眼來看，五代十國似乎會是很典型的一超（五代）型多極（十國）物質結構，按照權力平衡的邏輯應該是會形成類似北約對抗蘇聯的態勢。不過，此時中國北方尚有實力強大的契丹，體系權力分配是否因而呈現五代之一起契丹勢均力敵的兩極體系，尚需要進一步考察。由於年代久遠，詳細的兵馬錢糧、戶籍人口等資料恐難系統性地取得，故退而求其次，從雙方交戰的情況推敲相對的強弱。至於此時體系的穩定，同樣由於年代久遠，不易尋獲系統性的參戰兵力或死傷數據，也退而求其次，以戰爭發生的頻率來呈現。戰爭的類型還可進一步區分為「極」之間（契丹與五代之一起）的戰爭、「極」與「非極」之間（契丹或五代一起與十國之間）的戰爭，還有「非極」之間（十國之間）的戰爭，以用於更細節地比較體系穩定的變化。有關於五代十國的主流理念，由於整個時代僅維持不到 80 年，理念應該不會有快速的變動，可以視為一個整體查考當時主要的學說與思想著述。

另外，一般關於五代十國，有狹義與廣義兩種說法，後者將宋滅十國的時期也算入，本文採取廣義解釋，從此五代十國時期可用於考察的史書為《舊五代史》、⁵《新五代史》、⁶《十國春秋》。

5.《舊五代史》成書於宋代，編纂倉促，但參與編撰者皆歷經五代十國，所敘史實詳贍，書中「食貨」等十二志亦稱完備（杜維運，2004：43）。

6.《新五代史》是歐陽修有感五代十國道德淪喪，為了端正風俗令後世有所警戒，故發憤私修《新五代史》，甚至為此作了許多田野調查，也因此

秋》、⁷《遼史》、⁸《宋史》。⁹後續僅依據梁、唐、晉、漢、周等五代，連同宋滅十國的六個階段順序，逐一考察物質結構（請見表 2）（Waltz, 1986: 322-346; 2004: 2-6）、¹⁰戰爭發生情形¹¹及全期的主流理念，進行物質結構與理念結構的競爭性解釋比較，並分述如下。

-
- 《新五代史》中有濃烈的道德批判意識與歐陽修個人價值觀，令此書褒貶不一，但歐陽修的實地採訪，讓《新五代史》得以修正《舊五代史》當中錯漏之處，還原五代十國的歷史現場（杜維運，2004：44-50）。
- 7.《十國春秋》是清朝吳任臣有感歷代關於五代十國的史書，對十國的紀錄極其匱乏，即便如歐陽修實地走訪採集史料的《新五代史》，對十國也是簡略敘述：「詳若歐陽五代史，附十國世家於末，中間敘事雅稱簡潔，然頗多遺漏。」因此吳任臣設法蒐集各種民間資料，以補充十國歷史（吳任臣等，2010：1-1892）。
- 8.《遼史》、《宋史》、《金史》皆開修於元世祖中統 2 年（西元 1261 年），但因宋、遼、金孰為正統難有定論，故屢修屢改。元順帝至正 3 年（西元 1343 年），宰相脫脫擔任總裁官，決定「各與正統，各繫其年號」的三史分修路線編修，但隔年即倉促成書。由於遼國對於宮闈資料極為守密，洩密者當即論斬，導致遼史可參考資料極為稀缺，因而成書後內容簡略，但該書仍是後代瞭解遼國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杜維運，2004：119-121）。
9. 元修《宋史》兩年即倉促成書，且因蒙古學者對中文未臻熟稔，導致《宋史》內容幾近複印史料，龐亂繁蕪，但其優點也在於因此保留原始史料。透過宋史，可窺探宋朝起居注、時政記、日曆等未經刪裁的一手史料（杜維運，2004：123-124）。
10. 關於時代的劃分，本文直接採取華茲尋求儉約簡化的理論取向，將極態之變化視為一個有具體切面的物質實體，一如以 1945 年為界劃分多極與兩極體系，不考慮轉變緩衝的歷史塑成可能。
11. 有關戰爭次數計算，本文除逐一考察前述各史書古籍，也檢核對照兩份代表性的當代研究：《中國歷代戰爭年表》（中國軍事史編寫組，2001a；2001b）與《中國歷代戰爭史》（中國歷代戰爭史編纂委員會，1989a；1989b），請見本文附錄（<https://www.pf.org.tw/tw/pfch/17-11600.html>）。

表 2 五代十國的六個階段

階段	起訖時間	權力分配狀況
一梁	西元 907 年 5 月 15 日至西元 923 年 4 月 18 日	多極
二唐	西元 923 年 4 月 19 日至西元 936 年 11 月 16 日	兩極
三晉	西元 936 年 11 月 17 日至西元 947 年 2 月 23 日	兩極
四漢	西元 947 年 2 月 24 日至西元 951 年 2 月 28 日	單極 *
五周	西元 951 年 2 月 29 日至西元 960 年 1 月 30 日	一強型多極
六宋	西元 960 年 1 月 31 日至西元 979 年 6 月 3 日	一強型多極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說 明：* 單極在霸權穩定的邏輯下是導致穩定，但在權力平衡的邏輯下則是導致不穩定。本文在權力平衡理論的脈絡中討論，故推論單極導致不穩定。雙方的論辯請見（Wohlforth, 1999: 5-41; Layne, 1993: 5-51; Monteiro, 2011: 9-40）。

一、五代十國第一階段：多極

朱溫篡唐建立後梁，進入五代十國時期。五代十國時期第一階段（後梁太祖開平元年 4 月 1 日至後梁末帝龍德 3 年 3 月 30 日，西元 907 年 5 月 15 日至西元 923 年 4 月 18 日），是後梁、晉王與北方契丹勢均力敵的多極體系。後梁之強是因兵力人力最多，且挾天子以令諸侯。首先，朱溫在唐末黃巢之亂後掌握重兵，並在自身勢力範圍內另設法規，拒絕將資源上繳中央，故能充實一己之實力（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945）；¹²其次，朱溫挾天子以令諸侯。天祐元年（西元 904 年），朱溫強迫唐昭宗遷都洛邑，同時將長安居民一併強制搬移，擴充人力資源（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a：331-

12.原文爲：「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後。以夷門一鎮，外嚴烽侯，內辟汙萊，厲以耕桑，薄以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

333)。¹³ 晉王之強則是因掌握唐朝戰力最強大的部隊。後梁建立後仍遵奉唐朝正朔的晉王李克用是沙陀人，其年少時即展現強大的軍事才華，曾籌劃顛覆唐朝的軍事行動，但計畫失敗遂遠遁至韃靼部落（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a：331-333），至唐末黃巢之亂起，又受唐朝將領推薦歸國平亂。李克用連敗黃巢部隊，並將黃巢逼出長安，進而受封為唐國北界，專責抵禦主要強敵突厥的軍區負責人河東節度使，獲得河東部隊強大的軍事實力，澈底消滅黃巢勢力，成為雄霸一方的軍事強人（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a：336-337）。¹⁴

至於當時另一強權契丹，則是因自身原有的強大軍事能力，並引進了漢人的農業社會政治制度。身居東北的契丹族早在五胡亂華後便接受農耕，成為牧耕民族，因而能與漢族相處融洽。安史之亂後，中國東北地方雖為唐朝勢力範圍，但僅能與華北軍閥交流，與唐朝中央政府互不往來，因而在稅務、法律等逐漸自成系統。而後唐末軍閥割據，華北地方人民不堪剝削紛紛出逃，當中北移的河北地區人民便接受契丹保護，並貢獻自己的長才，強化了契丹與漢族的互動融合，使東北地區形成胡漢融合，提升了契丹的生產力（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828）。¹⁵ 同時，契丹透過兼併北方其他部族的過程，也逐步鍛鍊自己的軍事力量與擴大勢力（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

13. 原文為：「天祐元年正月己酉，帝發自大梁，西赴河中，京師聞之，為之震懼。是時，將議迎駕東幸洛陽，慮唐室大臣異議，帝乃密令護駕都指揮使朱友諒矯昭宗命，收宰相崔允、京兆尹鄭元規等殺之。又，邠、岐兵士侵逼京畿，帝因是上表，堅請昭宗幸洛，昭宗不得已而從之。帝乃率諸道丁匠財力，同構洛陽宮，不數月而成。」

14. 原文為：「是時，武皇既收長安，軍勢甚雄，諸侯之師皆畏之。」

15. 原文為：「……會潞平而止。劉守光末年苛慘，軍士亡叛皆入契丹。洎周德威攻圍幽州。燕之軍民多為所寇掠，既盡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漸盛。」

1977c：1827）。¹⁶

上述三者勢均力敵，彼此交戰時都無法取得決定性勝利。例如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唐天佑4年，西元907年）的「潞州之戰」，當時後梁進攻潞州，晉王李克用率軍奮力抵擋之際驟逝，後梁本因此占盡優勢但卻輕敵，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則於危急之時繼承王位，在全軍將士悲憤、上下一心的情況下逆轉局勢，擊退後梁軍隊（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a：41）。¹⁷又如後梁太祖乾化2年（西元912年），後梁再度出擊，直搗晉王陣營的根據地魏州，在攻下棗強後屠城搜刮，後梁軍隊勢如破竹，但晉王陣營卻未因此而慌亂，反而冷靜地設下埋伏狙擊，造成後梁大軍大敗而歸（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a：379-380）。¹⁸

能與後梁力戰的晉王陣營，面對契丹時也有能力對抗之。例如後梁末帝貞明2年（西元916年），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機親率30萬大軍突然進攻晉王陣營領地，造成蔚州守將李嗣本力抗戰死，晉王李

16.原文爲：「唐咸通末，其王曰習爾之，疆土稍大，累來朝貢。光啓中，其王欽德者，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蠶食諸郡，達靼、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族帳浸盛，有時入寇。」

17.原文爲：「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德威軍且去，因頗懈。王謂諸將曰：『梁人幸我大喪，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爲也，宜乘其怠擊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重崗，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

18.原文爲：「梁祖自督軍攻棗強。甲申，城陷，屠之。時李存審與史建瑭以三千騎屯趙州，相與謀曰：『梁軍若不攻蔭城，必西攻深、冀。吾王方北伐，以南鄙之事付我輩，豈可坐觀其弊。』乃以八百騎趨冀州，扼下博橋，令史建瑭、李都督分道擒生。翌日，諸軍皆至，獲芻牧者數百人，盡殺之；縱數人逸去，且告：『晉王至矣。』建瑭與李都督各領百餘騎，旗幟軍號類梁軍，與芻牧者雜行，暮及賀德倫營門，殺守門者，縱火大呼，俘斬而旋。又執芻牧者，斷其手，令迴，梁軍乃夜遁。」

存勗未及反應之時，耶律阿保機在兩個月內連破新、武、媯、儒等四州，晉王陣營從代北到陰山一帶的北方領土被契丹占據（脫脫著，楊家駱主編，1999a：11）；¹⁹但次年，後梁末帝貞明3年（西元917年），在契丹持續南下時，晉王陣營卻能利用天候與地形，發動奇襲反擊，大敗契丹大軍（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a：390）。²⁰

後梁、晉王、契丹三者形成的多極體系，也的確如物質邏輯的預期，呈現不穩定。三強之中任二者聯合將可壓倒第三方，且任一方也都有與另外兩者之一結盟的可能性，難以形成穩定的權力平衡，三方可謂人人有機會卻又個個沒把握，果然也導致此一階段的戰爭頻仍。總計第一階段16年間共發生40次戰爭，其中後梁、契丹與晉王間的戰爭共32次（A類，極之間的戰爭），後梁、契丹、晉王與十國間的戰爭共四次（B類，極與非極的戰爭），十國彼此間的戰爭共四次（C類，非極之間的戰爭），請見圖1。

19. 原文爲：「十一月，攻蔚、新、武、媯、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踰陰山，盡有其地。其圍蔚州，敵樓無故自壞，眾軍大噪，乘之，不踰時而破。是月，貝州平，以向任滄州降將毛璋爲貝州刺史。自是，河朔悉爲帝所有。」

20. 原文爲：「夏四月，命李嗣源率師赴援，次于涑水；又遣閻寶率師夜過祁溝，俘擒而還。周德威遣人告李嗣源曰：『契丹三十萬，馬牛不知其數，近日所食羊馬過半，安巴堅責讓盧文進，深悔其來。契丹勝兵散布射獵，安巴堅帳前不滿萬人，宜夜出奇兵，掩其不備。』嗣源具以事聞……帝遣李存審領軍與嗣源會于易州，步騎凡七萬。于是三將同謀，銜枚束甲，尋澗谷而行，直抵幽州。八月甲午，自易州北循山而行，李嗣源率三千騎爲前鋒。庚子，循大房嶺而東，距幽州六十里。契丹萬騎遽至，存審、嗣源極力以拒之，契丹大敗，委棄毳幕、氈廬、弓矢、羊馬不可勝紀，進軍追討，俘斬萬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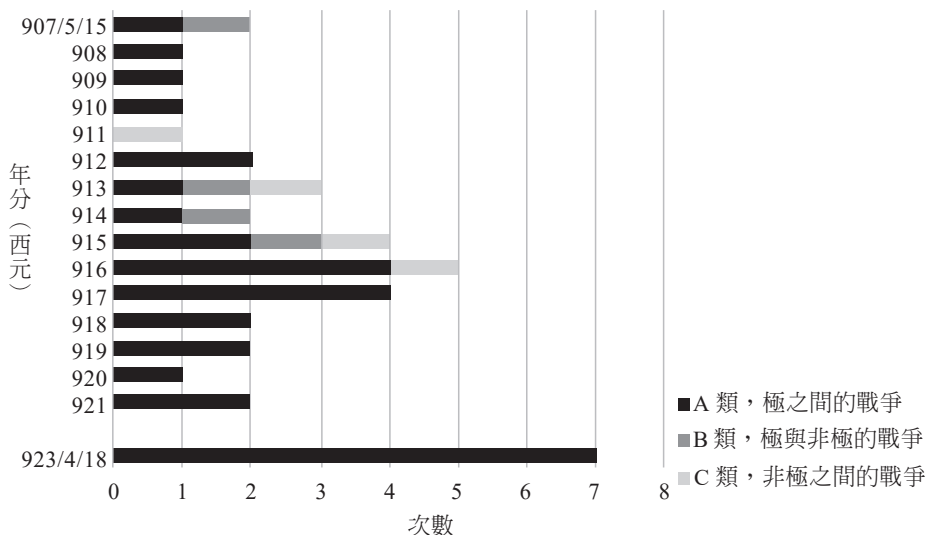


圖 1 第一階段多極體系下的戰爭次數統計

資料來源：請見本文附錄一 (<https://www.pf.org.tw/tw/pfch/17-11600.html>)。

二、五代十國第二階段：兩極

晉王李存勖滅後梁之後自稱大唐皇帝，史稱「後唐」，進入五代十國時期的第二階段（後唐莊宗同光元年 4 月 1 日至後唐廢帝清泰 3 年 10 月 30 日，西元 923 年 4 月 19 日至西元 936 年 11 月 16 日），是後唐與契丹勢均力敵的兩極體系。後唐之強是因河東軍區強大的軍事實力，在晉王李克用、李存勖兩代主帥與一眾優秀將領的淬鍊下，軍事實力更加提升。晉王李克用本就有卓越的軍事能力，而河東地區本就是唐朝時精兵所在之地，再加上手下又多是經驗豐富且才華洋溢的將領，因此有了與後梁、契丹一爭雌雄的底氣（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a：363）。²¹ 繼任的李存勖，就是以此強大的軍事實力為

21. 原文為：「武皇肇跡陰山，赴難唐室，逐豺狼于魏闕，殄氛祲于秦川，賜姓受封，奄有汾、晉，可謂有功矣。……若非嗣子之英才，豈有興王之

基礎，擊退背盟的契丹、殲滅敵對的後梁，一時間聲勢浩大（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a：479）。²² 另外，後唐明宗即位後，對文人極其禮遇，恢復農耕、休養生息，使後唐在五代中呈現出難得的民生小康、政治中興氣象（歐陽修著，楊家駱主編，1998：66）。²³ 契丹之強則是因為擴大接受漢人體制、強化農耕生產，故而國力持續累積（脫脫著，楊家駱主編，1999b：923-924；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830）。²⁴ 且根據史書記載，耶律阿保機一統契丹部族時，兵力已達 30 萬（脫脫著，楊家駱主編，1999a：395）；²⁵ 到西元 926 年時兵力更有數十萬，並且占據中國北方（脫脫著，楊家駱主編，1999a：396）。²⁶

後唐最後雖在後唐末帝清泰 3 年（西元 936 年）的太原之戰中敗於契丹（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a：664-668），但後唐此前屢次擊退、重挫契丹，可見雙方勢均力敵。例如後唐莊宗同光 2 年

茂業。」

22. 原文爲：「莊宗以雄圖而起河、汾，以力戰而平汴、洛，家仇既雪，國祚中興，雖少康之嗣夏配天，光武之膺圖受命，亦無以加也。」

23. 原文爲：「明宗雖出夷狄，而爲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適聲色，不樂遊畋。在位七年，於五代之君，最爲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

24. 原文爲：「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縱馬於野，馳兵於民。……太祖平諸弟之亂，弭兵輕賦，專意於農。……太宗會同初，將東獵，三克奏減輜重，疾趨北山取物，以備國用，無害農務。尋詔有司勸農桑，教紡績。以烏古之地水草豐美，使甌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爲農田。」「天祐末，安巴堅乃自稱皇帝，署中國官號。……城南別作一城，以實漢人，名曰漢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其國人號安巴堅爲天皇王。同光……三年，舉其眾討渤海之遼東，令禿餒、盧文進據營、平等州，擾我燕薊。」

25. 原文爲：「及太祖會李克用於雲中，以兵三十萬，盛矣。」

26. 原文爲：「天顯元年，滅渤海國。地方五千里，兵數十萬，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盡有其眾，契丹益大。」

(924年)，契丹入侵後唐，自9月起陸續劫掠幽州、蔚州、嵐州，後唐莊宗沉迷宴會與狩獵，未能即時處理，太尉李嗣源見情況危急卻遲無軍令，遂自行整軍出擊，最終在隔年於涿州擊退契丹軍隊（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a：431-445）。²⁷又如後唐明宗天成3年（西元928年），後唐太原王王都叛變並勾結契丹，後唐明宗並未親征而僅以宋州守將王晏球及鎮州守將王建立兩路迎戰，大破契丹、俘虜諸多重要將領，之後契丹欲以賠償贖回俘虜，後唐竟斬殺來使、完全無懼契丹（歐陽修著，楊家駱主編，1998：891-892）。²⁸再如後唐明宗長興元年（西元930年），雲州部隊竟然獨自成功劫掠契丹，獲得萬口牲畜（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a：563）。²⁹到了後唐末帝清泰2年（西元935年），契丹再次入侵後唐應州，後唐大軍出擊，也在易州擊退契丹（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a：648）。³⁰

後唐與契丹形成的兩極體系，也如同物質邏輯的預期，呈現相對的穩定。總計第二階段13年間共發生16次戰爭，其中後唐與契丹兩強間的戰爭共10次（A類，極之間的戰爭），後唐、契丹與其他國家間戰爭共四次（B類，極與非極的戰爭），十國彼此間的戰爭共兩次（C類，非極之間的戰爭），請見圖2。

27.原文爲：「契丹寇嵐州……李嗣源奏，部署大軍自宣武軍北征。同光三年……二月……李嗣源奏，涿州東南殺敗契丹，生擒首領三十人。」

28.原文爲：「及救王都，爲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邈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邈、荊剌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

29.原文爲：「丁巳，雲州奏：掩襲契丹，獲頭口萬計。」

30.原文爲：「六月甲子朔，新州上言，契丹入寇。……壬申，……契丹寇應州。……北面招討使趙德鈞奏……，見進軍追襲契丹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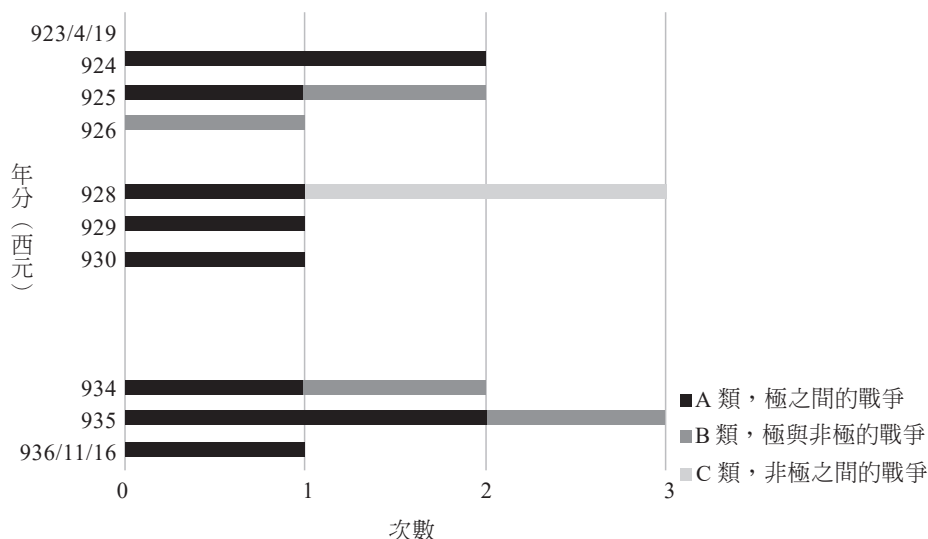


圖 2 第二階段兩極體系下的戰爭次數統計

資料來源：請見本文附錄二（<https://www.pf.org.tw/tw/pfch/17-11600.html>）。

三、五代十國第三階段：兩極

後唐將領石敬瑭聯合契丹滅後唐後建立後晉，進入五代十國時期的第三階段（後晉高祖天福元年 11 月 1 日至後晉出帝開運 4 年正月 30 日，西元 936 年 11 月 17 日至西元 947 年 2 月 23 日），是後晉與契丹勢均力敵的兩極體系。後晉能夠滅後唐，是因為後晉高祖石敬瑭深受後唐明宗重用，且統領後唐主力部隊、深得軍心，並主動向契丹稱臣避免雙方戰爭，而得以積存實力（歐陽修著，楊家駱主編，1998：77-79）。³¹至於契丹雖然在後唐明宗時期屢屢戰敗而暫時撤退

31. 原文為：「敬瑭常脫明宗於危。」「莊宗遇弒，明宗入立，拜敬瑭保義軍節度使，賜號『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兼六軍諸衛副使。」「是時，諸侯多不奉法，……明宗下詔書褒廉吏普州安崇阮……而以敬瑭為首。」「敬瑭求援於契丹。……敬瑭夜出北門見耶律德光，約為父子。」

（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a：648），³²但戰場皆在華北而未損其根本，且由於後晉高祖主動割地輸誠，因而獲得東北、華北等諸多交通要地，即所謂燕雲十六州；另一方面，契丹內部也持續漢化（歐陽修著，楊家駱主編，1998：894），³³並得以休養生息、維持國力（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834）。³⁴

後晉最後雖在後晉出帝開運3年（西元946年）的潯水軍變，因將領背叛而亡於契丹，但後晉此前屢次擊退、重挫契丹，可見雙方勢均力敵。例如後晉出帝開運元年（西元944年），後晉遭到契丹強大的騎兵掃蕩，貝州遭契丹攻破，守將戰死（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b：1084-1085），³⁵契丹更乘勝追擊，衝破雁門關強勢南下，後晉出帝決定親征（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b：1085），³⁶使入侵的契丹在後晉境內無法占上風。又如後晉出帝開運元年正月的黎陽關之戰，後晉以少擋多（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b：1085-1086），數日後的秀谷之戰，後晉更大破契丹，並持續追擊（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b：1086）。³⁷又如同年2月的第一次戚城會戰，後晉小隊遭契丹包圍，雙方血戰，後晉出帝率部親援，即突破

32原文為：「自是契丹大挫，數年不敢窺邊。」

33原文為：「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雁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

34原文為：「時契丹諸部頻年出征，蕃國君臣稍厭兵革，德光母嘗謂蕃漢臣僚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臥耶！自古及今，惟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待伊漢兒的當回心，則我亦不惜通好也。』」

35原文為：「乙亥，滄、恒、貝、鄴馳告，契丹前鋒趙延壽、趙延昭引五萬騎入寇，將及甘陵……己卯，契丹陷貝州，知州吳玘死之。」

36原文為：「太原奏，契丹入雁門，圍忻、代二州。恒、滄、邢三州上言，契丹大至。……壬午，詔取此月十三日車駕北征。」

37原文為：「辛丑，太原奏，與契丹戰於秀谷，斬首三千級，生擒五百人，獲敵將一十七人，賊軍散入鴉鳴谷，已進軍追襲。」

僵局（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b：1086）；³⁸兩日後的馬家渡會戰，後晉更大破契丹，俘獲並斬殺契丹將領數十人之多（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b：1087）。³⁹再如夏州守將李彝殷，率領蕃漢四萬大軍渡河入侵契丹，逼迫契丹軍隊分兵鞏固後方，造成 2 月北平之戰，敗退的契丹部隊甚至得破壞道路、拆毀橋梁，才能防止後晉軍隊追擊（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b：1087）。⁴⁰面對失利，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增兵 10 萬，御駕親征。後晉出帝不敢輕敵，布下伏兵、誘敵深入，雙方在第二次戚城之戰重兵對決，契丹軍隊無視伏兵展開衝鋒，後晉部隊英勇抵抗，雙方死傷慘重，令契丹部隊決定當夜後退 30 里至魏州，並分批退回契丹整頓（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b：1088）。⁴¹然而後晉並未因此歇息，反而加速掃蕩，同年 9 月的七里烽會戰，70 歲的老將白文珂大破留在後晉境內集結的契丹部隊，斬首千餘人並生擒高階軍官七十餘人（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

38 原文爲：「先鋒指揮使石公霸與契丹遇於戚城之北，爲契丹所圍。……契丹眾甚盛，被圍數重，遣人馳告景延廣，請益師。延廣遲留，候帝進止。行周等大噪，瞋目奮擊賊眾，傷死者甚多，帝自禦親兵救之方解。」

39 原文爲：「契丹築壘於馬家渡東岸，以騎軍列於外，以禦王師。李守貞以師搏之，遂破其眾。敵騎散走，赴河溺死者數千，遂拔其壘。初，西岸敵軍數萬，鼓噪揚旗以助其勢，及見東岸兵敗，號哭而去。獲馬八百匹，生擒賊將七十八人，部眾五百人，送行在，悉斬之。」

40 原文爲：「夏州節度使李彝殷合蕃漢之兵四萬抵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以牽脅之。易州刺史安審約奏，戰契丹於北平，賊退保祁溝關，斷其橋梁而還。」

41 原文爲：「三月癸酉朔，契丹主領兵十餘萬來戰。……伏精騎於頓丘故城，以待王師……契丹乃率精騎以攻東邊，王師敗走，敵騎追之。時有夾馬軍士千餘人在堤間治水寨，旗幟之末出於堰埭，敵望見之，以爲伏兵所起，追騎乃止。久之復戰，王師又退，李守超以數百騎短兵直起擊之，敵稍卻。戰場之地，人馬死者無算，斷箭殘鏃，橫厚數寸。遇夜，賊擊鉦抽軍而退，夜行三十里而舍焉。」

1977b：1095）。⁴²總計後晉出帝開運元年與契丹的戰爭，以後晉方面大獲全勝，可見後晉實力並不在契丹之下。

後晉出帝開運2年（西元945年）正月，契丹大軍捲土重來，後晉緊急調派部隊北上，但在榆林店遭遇契丹主力大部隊，幾乎全軍覆沒（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b：1099）。⁴³此役耶律德光為湍雪前恥，不斷投入軍力並親率部隊全面進攻，後晉部隊不斷遭遇人數優勢的契丹部隊切割只能迂迴撤退，最終雙方皆駐紮在白團衛村。此時後晉部隊的後勤已遭截斷，人馬饑乏、兵士甚至取泥絞汁而飲，耶律德光見狀下令部隊圍而不攻，藉此吸引後晉援軍。然而當地竟受沙塵暴侵襲，後晉將領認為與其束手就擒不如死戰，後晉部隊因此士氣高漲殺入契丹方陣，契丹軍隊爆發恐慌，耶律德光只好棄車逃竄，期間甚至狼狽到得拋盔棄甲、搶奪路邊的駱駝當坐騎狂奔逃亡，契丹大部隊則是慌竄20里後才在陽城重新集結、逐步撤退（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b：1103-1104）。⁴⁴後晉戰力之悍可見一斑，絕非契丹獨強。

不過，上述激戰都只發生在後晉最後三年，後晉、契丹的兩極體

42. 原文為：「九月……太原奏，代州刺史白文珂破契丹於七里烽，斬首千餘級，生擒將校七十餘人。」

43. 原文為：「開運二年春正月……契丹寇洺、磁，犯鄴都西北界，所在告急。壬子，王師與契丹相拒於相州北安陽河上，皇甫遇、慕容彥超率前鋒與敵騎戰於榆林店，遇馬中流矢，僅而獲免。」

44. 原文為：「癸亥，大軍至白團衛村下營。人馬俱渴，營中掘井，及水輒壞，兵士取其泥絞汁而飲。敵眾圍繞，漸束其營。是日，東北風猛，揚塵折樹。……守貞曰：『此風助我也。彼眾我寡，黑風之內，莫測多少，若候風止，我輩無噍類矣。』即呼眾軍齊力擊賊。張彥澤、符彥卿、皇甫遇等率騎奮擊，風勢尤猛，沙塵如夜，敵遂大敗。時步騎齊進，追襲二十餘里。至陽城東，賊軍稍稍成列，我騎復擊之，乃渡河而去。……是時，契丹主坐車中，及敗走，車行十餘里，追兵既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

系整體而言仍可謂相當穩定，這 10 年中的前七年戰爭甚少。總計第三階段共發生 31 次戰爭，其中後晉與契丹間的戰爭共 28 次（A 類，極之間的戰爭），後晉、契丹與十國間的戰爭共一次（B 類，極與非極的戰爭），十國彼此間的戰爭共兩次（C 類，非極之間的戰爭），請見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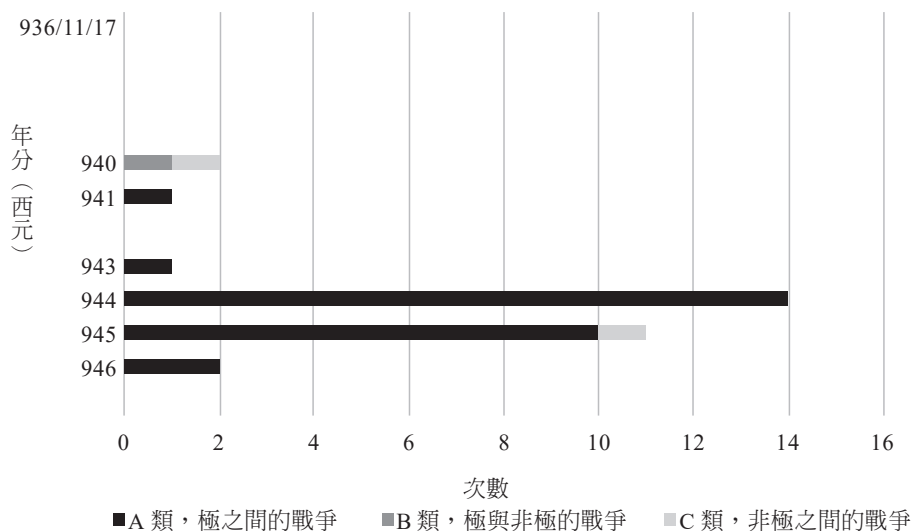


圖 3 第三階段兩極體系下的戰爭次數統計

資料來源：請見本文附錄三 (<https://www.pf.org.tw/tw/pfch/17-11600.html>)。

四、五代十國第四階段：單極

後晉開運 4 年（西元 947 年）契丹大軍進駐開封，將後晉領土納入勢力範圍，並將契丹更名為遼，後晉北平王劉知遠上表奉忠，成為遼國在華北地區的代理人，但遼軍不久北返，劉知遠遂乘機建立後漢，進入五代十國第四階段（後漢高祖天福 12 年 2 月 1 日至後漢隱帝乾祐 3 年 12 月 29 日，西元 947 年 2 月 24 日至西元 951 年 2 月 28 日）。不過後漢的成立引發臣服遼國者不滿而致內戰頻仍，短短四年

即因將領叛變而滅亡。後漢內亂的格局令當時華北地區無任何勢力可挑戰遼國，因此當遼國對後漢發動攻勢時，後漢毫無能力反擊，體系呈現單極的態勢。

遼國輾壓性也強大，例如後漢高祖天福 12 年（西元 947 年），耶律德光無法忍受再次遭到傀儡政權的背叛，率軍奪下後漢相州後屠城（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327）。⁴⁵後漢高祖聞訊後決定親征對抗，但竟在鄴都城就遭到親遼將領阻擋，部隊無法前進最終只能撤退（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338）。⁴⁶又如後漢隱帝乾祐元年（西元 948 年），遼軍駐紮在華北境內的部隊決定棄守定州北返，放火焚燬一切物資、建物，並將定州人民全部驅趕至遼境，後漢於事後才透過當地人書知道此事，根本無所作爲（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346）。又如後漢隱帝乾祐 2 年（西元 949 年）10 月，遼軍自貝州一路南掠至高鄴都北部，又轉往西北繼續燒殺擄掠，後漢隱帝命樞密使郭威前往北境巡蕩，但卻又派親信王峻監視郭威，導致郭威僅能消極應對，不敢反抗（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362）。⁴⁷

後漢不僅無力對抗遼國，也遭到南方勢力的輕視，可見後漢雖爲五代之一，但實力完全比不上後梁、後唐、後晉，實則與十國一般，不算強權。後漢隱帝乾祐元年（西元 948 年），蜀國嘗試勾結後漢叛將進攻後漢，雖遭到擊退，但顯示南方政權也無懼後漢的存在（薛居

45. 原文爲：「契丹主先遣僞命相州節度使高唐英率兵討之。未幾，契丹主至城下，是月四日攻拔之，遂屠其城。」

46. 原文爲：「……至鄴都城下。丙午，詔都部署高行周督眾攻城，帝登高阜以觀之，時眾議未欲攻擊，副部署慕容彥超堅請攻之，是日王師傷夷者萬餘人，不克而退。」

47. 原文爲：「契丹陷貝州高老鎮，南至鄴都北境，又西北至南宮、堂陽，殺掠吏民。數州之地，大被其苦，藩郡守將，閉關自固。遣樞密使郭威率師巡邊，仍令宣徽使王峻參預軍事。……。」

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344）。⁴⁸又如後漢隱帝乾祐3年（西元950年），南楚深陷內亂，但仍趁後漢內部大亂時分兵襲擊之（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369）。⁴⁹

綜合上述，此階段由於後漢衰弱，遼國獨強，各方無法匹敵，體系呈現單極。而此時的體系也高度不穩定，總計第四階段四年間共發生18次戰爭，遼國與後漢及其他十國的戰爭共10次（B類，極與非極的戰爭），後漢與十國及十國彼此間的戰爭共八次（C類，非極之間的戰爭），請見圖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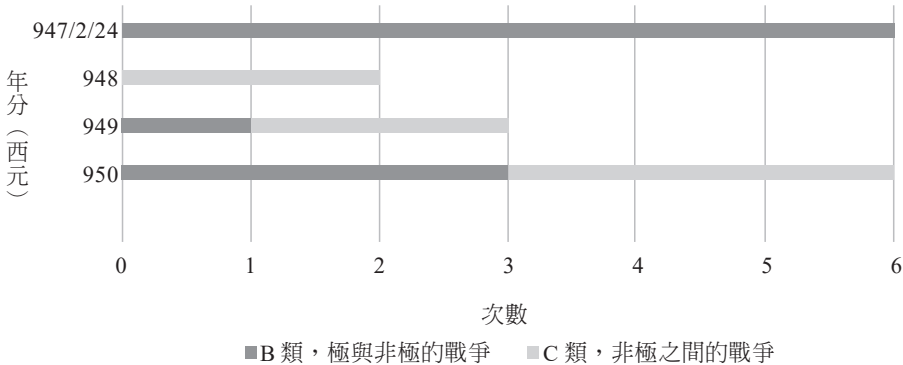


圖4 第四階段單極體系下的戰爭次數統計

資料來源：請見本文附錄四 (<https://www.pf.org.tw/tw/pfch/17-11600.html>)。

⁴⁸原文為：「右衛大將軍王景崇奏，於大散關大敗蜀軍，俘斬三千人。初，契丹犯京師，侯益、趙贊皆受其命，節制岐、蒲，聞高祖入洛，頗懷反仄。朝廷移贊於京兆，侯益與贊皆求援於蜀，蜀遣何建率軍出大散關以應之。至是，景崇糾合岐、雍、邠、涇之師以破之。」

⁴⁹原文為：「湖南上言，朗州馬希萼引五谿蠻及淮南洪州軍來攻當道，望量差兵士於淮境牽引。乙巳，遣前淄州刺史陳恩讓領軍入淮南界，以便宜進取。」

五、五代十國第五階段：一強型多極

郭威篡後漢，建立後周，進入五代十國第五階段（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1日至後周恭帝顯德6年12月29日，西元951年2月29日至西元960年1月30日）。後周之強係因郭威不同於其他五代君主往往雄橫猜忌，其本身深具領袖魅力，且得位後更是澄清吏治，明定稅、刑（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450-1451），⁵⁰杜絕浪費（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460），⁵¹且寬仁治國（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459），⁵²在勵精圖治下，後周實力大增。至於上一階段的超強遼國，在短短的數年中連續爆發軍事政變（脫脫著，楊家駱主編，1999a：70），⁵³內耗導致國勢中衰（脫脫著，楊家駱主編，1999a：72），⁵⁴盛況不復。甚至十國之中，占據山西北部的後漢宗室劉崇／劉旻仍奉後漢為正統，史稱北漢，因獲得一眾優秀後漢文武官員的支持，也躍升為後周在北方的勁敵（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811）。⁵⁵此外，南唐在十國中本來就實力最強，南唐烈祖主政後偃兵息甲與民休息、⁵⁶厚植經濟（歐陽修著，楊家駱主

50. 原文為：「帝在軍……臨矢石，冒鋒刃，必以身先，與士伍分甘共苦。稍立功效者，厚其賜與；微有傷痍者，親為循撫。……人之過忤，未嘗介意，故君子小人皆思效用。」「今後諸道所有祥瑞，不得輒有奏獻。」

51. 原文為：「天下倉場、庫務，宜令節度使專切鈐轄，掌納官吏一依省條指揮，不得別納門餘、秤耗，舊來所進羨余物色，今後一切停罷。」

52. 原文為：「應諸犯罪人等，除反逆罪外，其罪並不得籍沒家產、誅及骨肉，一依格令處分。」

53. 原文為：「政事令婁國、林牙敵烈，侍中神都、郎君海裡等謀亂就執。」

54. 原文為：「李胡子宛、郎君嵇干、敵烈謀反，事覺，辭逮太平王翬撒葛、林牙革割、郎君新羅等，皆執之。」

55. 原文為：「周廣順元年正月，崇僭號於河東，稱漢，改名旻，仍以乾祐為年號。署其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判官鄭拱、趙華為宰相，副使李瑰、代州刺史張暉為腹心。」

56. 原文為：「錢氏自吳時素為敵國。昇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及將篡國，

編，1998：768）；⁵⁷此後南唐元宗更是足智多謀，準確利用他國內亂之際，出兵併吞、擴大地盤（歐陽修著，楊家駱主編，1998：770，772），⁵⁸使南唐資源更加豐富（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787）。⁵⁹

在這四者之中，後周因為版圖最大且位居中央位置，因而最為有利，但又未達壓倒性優勢，使體系呈現一強型多極態勢。後周面對遼國多次劫掠，都由在地守將擊退，甚至能北伐收復失地，可見遼國實力遜於後周，例如後周太祖廣順三年（西元 953 年），遼國出兵定州，定州守軍發動夜襲，遼國部隊四散潰逃（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489）。⁶⁰到了後周世宗時期也是如此，例如後周世宗顯德 5 年（西元 958 年），後周與遼國在長清寨交戰，後周也取得勝利（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576）。⁶¹次年，後周世宗顯德 6 年（西元 959 年），後周世宗北伐，一路收復後晉時割讓給遼國的土地，軍隊所到之處，守將不戰而降，後周兵不血刃將關南收復，而遼國竟無動作（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580-1581）。⁶²

先與錢氏約和。」

57. 原文為：「昇志在守吳舊地而已，無復經營之略也，然吳人亦賴以休息。」

58. 原文為：「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弑其君，王延義、文進自立。……王氏兄弟連兵累年，閩大亂，景因其亂遣查文徽及待詔臧循發兵攻建州。」「楚人囚希萼於衡山，立其弟希崇，附于景，楚國大亂。景遣信州刺史邊鏞攻楚，破潭州，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

59. 原文為：「其地東暨衢、婺，南及五嶺，西至湖湘，北據長淮，凡三十餘州，廣袤數千里，盡為其所有，近代僭竊之地，最為強盛。又嘗遣使私賂契丹，俾為中國之患，自固偷安之計。」

60. 原文為：「定州奏，契丹攻義豐軍，出勁兵夜斫蕃營，斬首六十級，契丹遁去。」

61. 原文為：「己未，昭義李筠奏，破遼州長清寨。」

62. 原文為：「帝率諸軍北征。……關南平，凡得州三、縣十七、戶一萬

後周對北漢的戰爭也都能取勝，但不具決定性，例如後周太祖廣順元年（西元 951 年），北漢趁後周政局不穩襲擊後周晉州城，後周順利擊退北漢軍隊（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468）；⁶³又如次年後周太祖廣順 2 年（西元 952 年），北漢又嘗試入侵府州，再遭後周擊退（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480）；⁶⁴再如後周世宗顯德元年（沿用年號後周太祖顯德元年，西元 954 年）正月，後周太祖駕崩，北漢得知消息後，旋即在 2 月聯合遼國入侵後周，雙方軍隊在高平一地展開決戰，也由後周獲勝（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511-1513）。⁶⁵後周部隊雖然戰勝，但已疲憊不堪，最終只能撤軍（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516-1517），⁶⁶可見後周雖強於北漢，但並沒有壓倒性的優勢。

後周雖最強盛，但對南唐也不足以取得決定性勝利。如後周世宗顯德 3 年（西元 956 年），後周與南唐在上窯大戰後乘勝追擊，先

八千三百六十。是役也，王師數萬，不亡一矢，邊界城邑皆望風而下。」

⁶³原文爲：「晉州王晏奏『河東劉崇遣僞招討使劉鈞、副招討使白截海，率步騎萬餘人來攻州城，以今月五日五道齊攻，率州兵拒之，賊軍傷死甚眾。』」

⁶⁴原文爲：「府州防卸使折德辰奏，河東賊軍寇境，率州兵破之，斬首二千級。」

⁶⁵原文爲：「潞州奏，河東劉崇與契丹大將軍楊衮，舉兵南指。……潞州奏，河東劉崇入寇，兵馬監押穆令均部下兵士爲賊軍所襲，官軍不利。……詔以劉崇入寇，車駕取今月十一日親征……王師與河東劉崇、契丹楊衮大戰於高平，賊軍敗績。」

⁶⁶原文爲：「車駕發潞州，親征劉崇。……觀兵於太原城下，帝親自慰勉，錫賚有差。……是夜大風，發屋拔樹。時大集兵賦，及征山東、懷、孟、蒲、陝丁夫數萬，急攻其城，旦夕之間，期於必取。會大雨時行，軍士勞苦，復以忻口之師不振，帝遂決旋師之意。指麾之間，頗傷勿遽，部伍紛亂，無復嚴整，不逞之徒訛言相恐，隨軍資用頗有遺失者，賊城之下，糧草數十萬，悉焚棄之。」

在正陽大破南唐守軍，又臨陣斬殺大將劉彥貞、生擒副將鹹師朗等。當後周軍隊準備搭浮橋包圍壽春城時，主帥李穀認為後周軍隊不黯水性，如果浮橋被斷則進退無據，因此決定撤除包圍網，此一退守正陽的過程，反遭到南唐水軍襲擊，局勢一度混亂，險全軍覆沒，幸好後周世宗急遣侍衛長李重進率師持穩，後周軍隊才得勉強撤退（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539-1540）。⁶⁷

綜合上述，後周雖最強盛，能北征遼國、擊退北漢、進攻南唐，但皆未能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屬最不穩定的一強型多極態勢，而此一階段的確也高度不穩定，且的確也較第一階段的多極體系更不穩定。總計第五階段九年間共發生 57 次戰爭，其中後周、遼國、北漢、南唐間的戰爭共 51 次（A 類，極之間的戰爭），後周、遼國、北漢、南唐與其他各國間的戰爭共五次（B 類，極與非極的戰爭），後周、遼國、北漢、南唐以外其他各國彼此間的戰爭共一次（C 類，非極之間的戰爭），請見圖 5。

⁶⁷原文為：「軍回之際無復嚴整，公私之間頗多亡失，淮北役夫亦有陷於賊境者。帝聞之，急詔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率師赴之。時淮賊乘李穀退軍之勢，發戰棹數百艘沿淮而上，且張斷橋之勢，彥貞以大軍列陣而進。李重進既至正陽，聞淮軍在近，率諸將渡橋而進，與賊軍遇，重進等合勢擊之，一鼓而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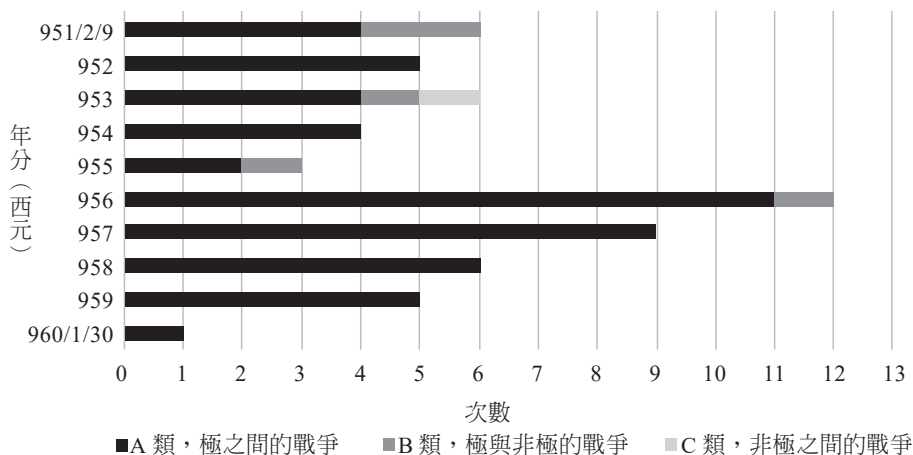


圖 5 第五階段一強型多極體系下的戰爭次數統計

資料來源：請見本文附錄五 (<https://www.pf.org.tw/tw/pfch/17-11600.html>)。

六、宋滅十國階段：一強型多極

趙匡胤陳橋兵變後建宋，逐步消滅剩餘的十國完成統一，史學上視為廣義的五代十國時期（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 1 日至宋太宗太平興國 4 年 5 月 6 日，西元 960 年 1 月 31 日至西元 979 年 6 月 3 日）。此時的體系延續後周時期，也可謂是宋優勢的一強型多極。宋之強體現在保有後周優秀軍事人才，故而延續後周軍事實力，例如宋太祖開寶 3 年（西元 970 年），宋滅南漢的韶州決戰，南漢禁衛精銳盡出，甚至將華北戰場從未出現的戰象置於最前列，但宋軍仍能從容應對（脫脫著，楊家駱主編，1998c：13926）。⁶⁸

不過宋的強盛並非壓倒性的，尚未達到一超的程度，而北漢仍

⁶⁸原文為：「美等攻韶州，都統李承渥以兵數萬陣蓮華山下。初，銀教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至是與美遇，美盡索軍中勁弩布前以射之，象奔蹊，乘象者皆墜，反踐承渥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韶州陷，擒刺史辛延渥、諫議大夫卿文遠。」

能算得上是一極，可以抵禦宋軍，例如宋太祖開寶 2 年（西元 969 年），親征北漢並兵臨太原城下，但久攻無果，宋軍甚至掘開汾水堤防引水淹城，但北漢軍民一心，導致宋軍損兵折將，僅能退兵（脫脫著，楊家駱主編，1998a：28-29）。⁶⁹ 至於南唐雖在元宗時已對後周稱臣，成為後周的藩屬，至南唐後主李煜繼位，對宋朝更加恭順，自請修改國號，上表跪請宋國允許並縮編政府規模，然卻暗地裡整軍經武，等待變局（脫脫著，楊家駱主編，1998c：13859），⁷⁰ 且其也能抵抗宋軍，亦仍為一極，例如宋南唐秦淮河會戰後，宋軍開始包圍金陵城，但南唐仍有大批軍隊在長江上游，因此宋太祖聽聞南唐將領朱令贇親率 15 萬大軍，試圖衝破采石磯順流馳援時，也不得不親自下令截擊（脫脫著，楊家駱主編，1998b：9201）。⁷¹

遼國在歷經遼世宗、遼穆宗兩朝的政變迭起後，由遼景宗繼位。遼景宗自幼因激烈的宮廷內鬥導致心神耗弱、體弱多病，但不失寬仁之心，即位後雖長期因病臥床，政務多委由蕭皇后蕭綽處理，然蕭皇后極富政治才能，盡心為國，一掃前朝外戚、宗藩惡鬥之風（脫脫著，楊家駱主編，1999b：1202），⁷² 國力有所恢復。然在此階段，遼國著重在平息內部政治鬥爭，對宋只能以援助北漢作為牽制方案，

⁶⁹ 原文為：「三月……臨城南，謂汾水可以灌其城，……乃北引汾水灌城。五月……自戊子至庚寅，命水軍載弩環攻，橫州團練使王廷義、殿前都虞候石漢卿死之。……諸軍欲登城以死攻，上愍之，不允。閏月……議班師。」

⁷⁰ 原文為：「雖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募兵，潛為戰備。」

⁷¹ 原文為：「時南唐將朱令贇自江領眾十五萬，連大艦沿流而下，將焚採石浮梁，抵金陵為援。……帝曰：『……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人諭明，令樹長木於洲浦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之，果疑大軍襲其後，逗撓不敢進。明移檄諸軍，相為犄角，因督兵棹襲之。至小孤山，與諸軍合勢，大破之，擒令贇，眾赴水死者十五六。」

⁷² 原文為：「后明達治道，聞善必從，故群臣咸竭其忠。」

可見宋仍居於優勢（脫脫著，楊家駱主編，1999a：105）。⁷³

綜合上述，宋雖最強盛，能夠消滅南方非極勢力及國力衰弱的南唐與北漢，也能把握機會，在遼國軍隊援助北漢犯下戰略錯誤時給予致命打擊，但觀其與北漢的纏鬥延宕十餘年，且南唐在面對宋軍的入侵時，其反擊也一度獲得戰果，可知宋的強大並非是壓倒性的，體系屬最不稳定的一強型多極態勢。此時戰爭的發生也的確相當頻繁，總計第六階段 20 年間共發生 96 次戰爭，其中宋、遼國、北漢、南唐間的戰爭共 59 次（A 類，極之間的戰爭），宋、遼國、北漢、南唐與其他各國間的戰爭共 37 次（B 類，極與非極的戰爭），宋、遼國、北漢、南唐以外其他各國彼此間的戰爭共零次（C 類，非極之間的戰爭），請見圖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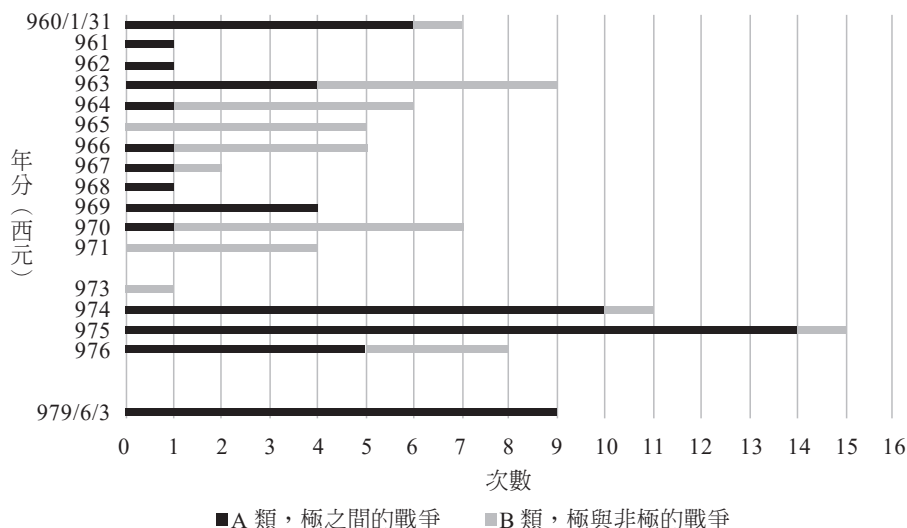


圖 6 第六階段一強型多極體系下的戰爭次數統計

資料來源：請見本文附錄六 (<https://www.pf.org.tw/tw/pfch/17-11600.html>)。

⁷³原文為：「竭國之力以助河東，破軍殺將，無救滅亡。雖一取償於宋，得不償失。」

七、五代十國的主流理念

五代十國全期的主流理念，經過檢索，的確與既有研究所見一致，一直都是爭權奪利、不顧信義。這種理念會促使體系不穩定，因為不講信義就是隨利益而反叛、趨炎附勢，強者更強，不易形成權力平衡，總計在史料中出現 34 次。例如唐末群雄割據，羅紹威認為各地守將都以復興唐室為藉口謀取自己的利益，遂以「就算朱溫不篡位，其他人也會篡位」的說法勸朱溫篡唐代之：「羅紹威乘間謂太祖曰：『邠、岐、太原終有狂譎之志，各以興復唐室為詞，王宜自取神器，以絕人望。天與不取，古人所非。』太祖深感之。」（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a：190）又如晉王將領李嗣昭陣亡，晉王李存勖令李嗣昭諸子回太原奔喪；諸子皆不從，並商議歸順朱溫：「嗣昭既卒，莊宗詔諸子扶喪歸太原襄事，諸子違詔。……弟繼遠，年十五六，謂繼韜曰：『兄有家財百萬，倉儲十年，宜自為謀，莫受人所制。』繼韜曰：『定哥以為何如？』曰：『申蒙之言是也。河北不勝河南，不如與大梁通盟，國家方事之殷，焉能討我？無如此算。』」（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b：760-761）再如後唐軍官王繼弘，後仕後晉，受後晉將領唐英賞識並重用。後漢成立，後漢高祖欲攬絡唐英，王繼弘與同僚聞訊後將唐英暗殺，並將領地上奉後漢高祖。時人責罵王繼弘見利忘義，王繼弘竟不以為恥，並辯說自己只是一個小人物，如果不把握機會，則一生將無緣榮華富貴。即便如此無恥，後周成立後，王繼弘仍能在朝為官：「王繼弘，……契丹主留高唐英為相州節度使。唐英善待繼弘，每候其第，則升堂拜繼弘之母，贈遺甚厚，倚若親戚，又給以兵仗，略無猜忌。會契丹主死，漢祖趨洛，唐英遣使歸款，漢祖大悅，將厚待唐英，使未回，繼弘與指揮使樊暉等共殺唐英，繼弘自稱留後，令判官張易奉表於漢祖。人或責以見利忘義，繼弘曰：『吾儕小人也，若不因利乘便，以求富貴，畢世以來，未可得志也。』……廣順初，加同平章事。……」（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1643）。

與前述相反，強調道德，寧死不屈的理念，則會促進權力平衡而有利穩定，但相關的記載甚少，只有七次。例如後梁與晉王交戰，後梁猛將王彥章戰敗，寧死不降：「……晉王素聞其勇悍，欲全活之，令中使慰撫，以誘其意。彥章曰：『比是匹夫，本朝擢居方面，與皇帝十五年抗衡；今日兵敗力窮，死有常分，皇帝縱垂矜宥，何面目見人！豈有爲臣爲將，朝事梁而暮事晉乎！得死，幸矣！』」（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a：292）又如後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甫遇在潯水軍變，絕食殉國：「四年，契丹復至，從杜重威營潯水，重威送款於契丹，遇不預其議，及降，心不平之。時契丹欲遣遇先入汴，遇辭之，因私謂人曰：『我身荷國恩，位兼將相，既不能死於軍陣，何顏以見舊主！更受命圖之，所不忍也。』明日，行至趙郡，泊其縣舍，顧從者曰：『我已信宿不食，疾甚矣，主辱臣死，無復南行。』因絕吭而殞，遠近聞而義之。」（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b：1260-1261）。

至於另一個在檢索中發現的理念是「夷夏之防」，雖可能加劇漢人與契丹間的戰爭，但相反地，也能促使漢人間的團結，進而嚇阻契丹，應能促使體系穩定，但此占更少數，僅出現五次。例如後晉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景延廣痛恨契丹蠻橫無禮，認爲依照年齡輩分，耶律德光可稱呼後晉出帝爲孫，但後晉與契丹並立，斷無稱臣之理，更告知契丹使節，後晉不怕對契丹開戰：「……契丹怒，遣使來讓，延廣乃奏令契丹回國使喬榮告戎王曰：『先帝則北朝所立，今上則中國自策，爲鄰爲孫則可，無臣之理。』且言：『晉朝有十萬口橫磨劍，翁若要戰則早來，他日不禁孫子，則取笑天下，當成後悔矣。』由是與契丹立敵，干戈日尋。」（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b：1144）。

又於檢索中再發現一個理念，是認爲天下必須統一的「大一統」思想，不過僅發現一筆，更不成氣候。這是發生在宋太祖南征南唐時，南唐後主李煜派遣名士徐鉉爲說客請宋退兵，但宋太祖以天下分

久必合的大一統思想拒絕：「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蓋王者之興，天下必歸于一統』。」（歐陽修著，楊家駱主編，1998：779-780）以上請見本文附錄七（<https://www.pf.org.tw/tw/pfch/17-11600.html>）。

由此，如果五代十國全期理念結構的作用也壓倒了物質結構的作用，那麼此時無論體系中權力分配如何改變，體系仍會因爲長期爭權奪利、無視信義的普遍理念，而持續地不穩定。然而，從前述六個階段的資料查詢與彙整後卻可以發現，五代十國全期在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屬兩極體系時，顯得特別穩定（請見圖 7），可見此時是物質結構的作用壓倒了理念結構的作用，兩極體系最穩定的論點，反而在五代十國時期獲得驗證。儘管第三階段最後三年戰爭的發生突然急遽升高，但這短暫的例外並不能以整體普遍理念來解釋，而應該從個別的單元層級來尋求修補性的解釋。

肆、結語

在俄烏戰爭爆發，歐洲有無如冷戰結束之初所預期「回到未來」的疑惑中，本文重新喚醒了有關體系權力分配與體系穩定的國際政治理論探討，並接續既有針對中國古代春秋戰國時期物質結構與理念結構競爭解釋的研究，探查了無論在國際關係學還是歷史學界都甚少著墨的五代十國時期，延伸經驗證據範疇以爲當代國際關係中對於體系穩定的理論研究產生啓示。

從中，本文初步發現了相當意外的結果，即導致穩定的物質結構作用壓倒了導致衝突的理念結構作用，兩極體系較穩定的論點，反而在五代十國時期獲得了支持。雖然五代十國全期普遍的主流理念是爭權奪利、不顧信義，此應導致持續的不穩定，但五代十國時期體系的穩定，卻隨著權力分配結構的改變而有顯著起伏。先是後梁、晉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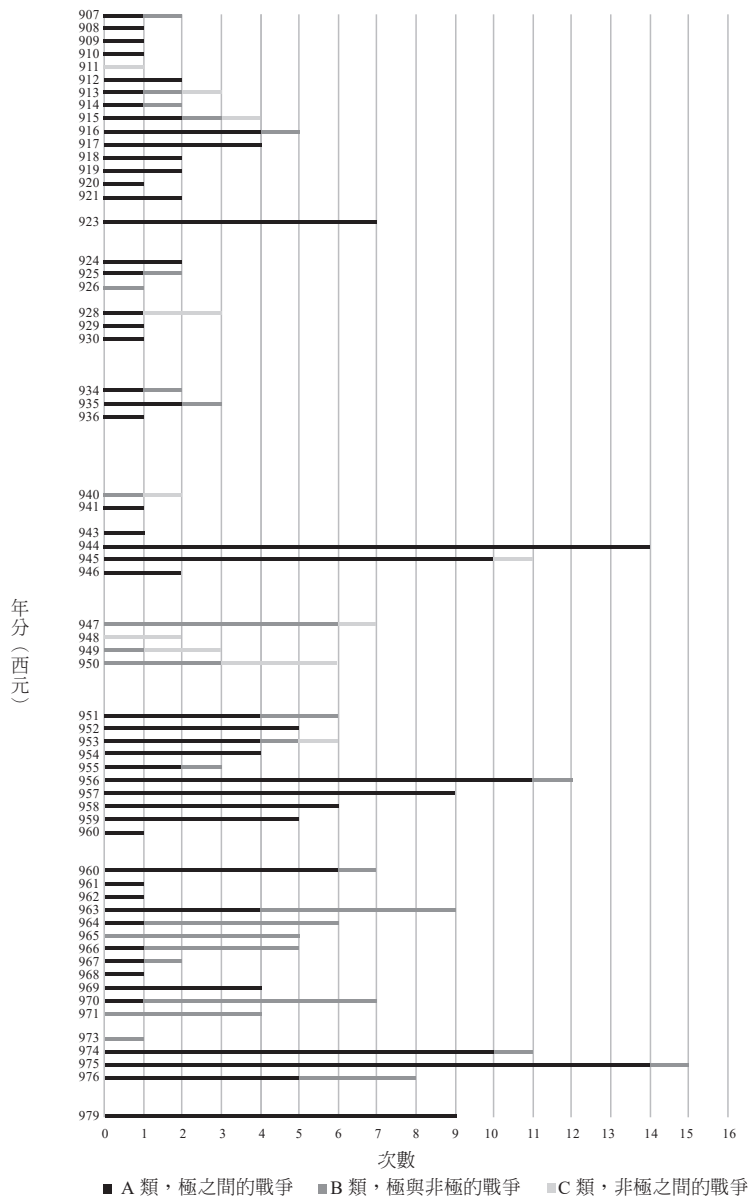


圖 7 五代十國全期戰爭次數統計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圖 1 至圖 6 自行繪製。

契丹之間的多極體系，16 年間發生 40 次戰爭，平均每年 2.5 次；再來是後唐與契丹之間、後晉與契丹之間的兩極體系，23 年間發生 47 次戰爭，平均每年僅 2.04 次；隨後遼國獨強的單極體系，四年間發生多達 18 次戰爭，平均每年高達 4.5 次；最後是後周相對優勢下與遼國、北漢、南唐，以及宋相對優勢下與遼國、北漢、南唐所形成的一強型多極體系，28 年間共發生 153 次戰爭，平均每年更達 5.47 次之多。合計多極與一強型多極的 44 年間，共發生 193 次戰爭，平均每年 4.38 次，遠高於兩極時的 2.04 次，從中可見，兩極體系穩定此一誕生於歐洲歷史的理論，反而在中國的古代獲得強烈支持。

本文指出了未來持續進行物質與理念結構競爭解釋的研究方向，正所謂以古鑑今、鑑往知來，如何在更大的時空範圍內進行跨時且跨域的理論研究，嘗試在既有的基礎上不斷累積精進，發展出解釋力更強大的理論，值得國際關係學界持續探索。在五代十國之後，前後長達 300 多年的魏晉南北朝時代，將會是令人期待的進一步研究，其間體系的權力分配，亦發生了許多變化。從一開始魏蜀吳的三國時期，蜀、吳聯手抗魏，似乎是很典型的一超型多極；接著西晉短暫統一之後，東晉與北方五胡十六國也很像是一超型多極；隨後南朝宋、齊與北魏似形成了兩極；而後北朝分裂為西魏、東魏，還有接續的北周、北齊，與同時期南朝梁、陳的並立，又像是三國時期一超型多極的南北倒置；而後北方為隋統一，又使體系重歸兩極。這些不同時段中體系穩定的起伏變化究竟如何？其間主流理念又如何？會是物質結構或理念結構較有解釋力？均可一一探索。從此，雖不能得出橫亘古今中外都萬無一失、完美無缺的理論，但至少能使我們離最終極理想的目標更進一步。

當然，相對於古代的歷史，世人不免更關心當前的國際情勢發展，並更急切地希望對未來國際局面的動盪有準確的預測甚至控制。就此而言，本文從五代十國的研究中得出，兩極體系的穩定作用勝出，惟此是屬於同區域中陸地上的兩極，是否能夠直接適用在當今位

處兩個區域的美、中雙方，進而導致全球性的普遍穩定？還是說各地會有頻繁的代理人戰爭？同時，美、中是否構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兩極體系（如同前文所述，冷戰歷來雖習於被稱為全球性的美蘇兩極體系，但嚴格來說卻應是美國協助歐洲各國對付蘇聯的歐洲「一超型多極」體系）？北京方面迄今仍沒有如過往蘇聯那般，對其他區域進行大規模軍事干預或援助，以近年來中東升高的動盪來看，似乎在全球範圍裡更多呈現的是美國不受制衡的單極體系。在物質結構狀態之外，體系中的理念結構狀態一樣有待進一步探索：相對於冷戰結束之初「歷史終結」論之下，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全面勝利的自信滿滿，當代國際體中許多強國卻有民粹主義、極端主義興起的趨勢。是否物極必反，世界的主流理念正導致不穩定？而這與導致穩定的物質結構之間，又會是何者的作用勝出？

凡此種種疑點都指出，持續進行更大時空範圍內物質與理念結構作用的競爭解釋研究至為重要。過去的經驗不能直接套用於當前的世界，並不是過去經驗沒有研究價值，而恰恰是指出了吾人得更透澈去瞭解，過往與現在究竟有何關鍵變數上的差異，才真的有辦法對當前與未來的局勢演變有所掌握。

收件：2025 年 1 月 20 日

修正：2025 年 9 月 4 日

採用：2025 年 9 月 12 日

※ 本文為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執行部分成果（計畫編號：NSTC 114-2410-H-606-012-MY2）。本文純屬作者個人觀點。

※ 本文附錄一至附錄七，限於篇幅無法隨文刊出，完整附錄請見
<<https://www.pf.org.tw/tw/pfch/17-11600.html>>。

參考文獻

- 中國軍事史編寫組（2001a）。中國歷代戰爭年表（上冊）。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Zhongguo junshi shi bianxiezu (2001a). *Zhongguo lidai zhanzheng nianbiao (shang ce)*. Zhongguo renmin jiefangjun Publishing House.]
- 中國軍事史編寫組（2001b）。中國歷代戰爭年表（下冊）。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Zhongguo junshi shi bianxiezu (2001b). *Zhongguo lidai zhanzheng nianbiao (xia ce)*. Zhongguo renmin jiefangjun Publishing House.]
- 中國歷代戰爭史編纂委員會（1989a）。中國歷代戰爭史（十）。黎明文化公司。[Zhongguo lidai zhanzheng shi bianzhuang Weiyuanhui (1989a). *Zhongguo lidai zhanzheng shi (shi)*. Liming Cultural Company.]
- 中國歷代戰爭史編纂委員會（1989b）。中國歷代戰爭史（十一）。黎明文化公司。[Zhongguo lidai zhanzheng shi bianzhuang Weiyuanhui (1989b). *Zhongguo lidai zhanzheng shi (shiyi)*. Liming Cultural Company.]
- 朱增泉（2011）。五代十國戰爭。神劍，2011（4），頁 103-129。[Zhu, Z. Q. (2011). The Wars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Divine Sword*, 2011 (4), pp. 103-129.]
- 牟錫川、王旭烽（2024）。五代十國馬楚政權茶葉經濟政策及其影響。中國茶葉，46（10），頁 59-66。[Mou, X. C. & Wang, X. F. (2024). The Tea Economy Policies of the Ma-Chu Regime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and Their Influence. *China Tea*, 46 (10), pp. 59-66.]
- 杜文玉（2011）。五代十國經濟史。學苑出版社。[Du, W. Y. (2011).

Wudai shiguo jingji shi. Xueyuan Publishing House.]

杜維運（2004）。中國史學史（三）。三民書局。[Du, W. Y. (2004).

Zhongguo shixue shi, (san). Sanmin Book Company.]

吳任臣著，徐敏霞、周瑩校（2010）。十國春秋。中華書局。[Wu,

R. Z. zhu, Xu, M. X., & Zhou, Y. jiao. (2010). *Shiguo chunqiu*.

Zhonghua Book Company.]

李宗翰（2023）。五代十國墓誌文化之時空分布與發展。師大學報，

68（1），頁45-85。[Lee, T. H. (2023).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of Tomb Epitaphs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Period. *Journal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68 (1), pp. 45-85.]

李揚帆（2015）。「中華帝國」的概念及其世界秩序：被誤讀的天下秩序。國際政治研究，2015（5），頁28-48。[Li, Y. F. (2015).

‘Zhonghuadiguo’ de gainian jiqi shijie zhixu: bei wudu de tianxia zhixu.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5 (5), pp. 28-48.]

脫 脫著，楊家駱主編（1998a）。宋史附太宗實錄殘存二十卷、宋

史翼、綜合索引（一）。鼎文。[Tuo, T. zhu, Yang, J. L. zhubian (1998a). *Song shi fu taizong shilu cancun ershi juan, song shi yi, zonghe suoyin (yi)*. Dingwen.]

脫 脫著，楊家駱主編（1998b）。宋史附太宗實錄殘存二十卷、

宋史翼、綜合索引（十一）。鼎文。[Tuo, T. zhu, Yang, J. L. zhubian (1998b). *Song shi fu taizong shilu cancun ershi juan, song shi yi, zonghe suoyin (shiyi)*. Dingwen.]

脫 脫著，楊家駱主編（1998c）。宋史附太宗實錄殘存二十卷、

宋史翼、綜合索引（十七）。鼎文。[Tuo, T. zhu, Yang J. L. zhubian (1998c). *Song shi fu taizong shilu cancun ershi juan, song shi yi, zonghe suoyin (shiqi)*. Dingwen.]

脫 脫著，楊家駱主編（1999a）。新校本遼史附遼史源流考

- (一)。鼎文。[Tuo, T. zhu, Yang J. L. zhubian (1999a). *Xin jiaoben liao shi fu liao shi yuanliu kao (yi)*. Dingwen.]
- 脫 脫著，楊家駱主編（1999b）。新校本遼史附遼史源流考（二）。鼎文。[Tuo, T. zhu, Yang, J. L. zhubian (1999b). *Xin jiaoben liao shi fu liao shi yuanliu kao (er)*. Dingwen.]
- 曾國富（2018）。五代時期後晉與契丹戰爭論。武陵學刊，43（5），頁 46-52。[Tseng, K. F. (2018). On the Wars between Later Jin and Khitan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Wuling Journal*, 43 (5), pp. 46-52.]
- 楊仕樂（2024）。物質結構與理念結構的競爭解釋：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期。政治科學論叢，（100），頁 89-182。[Yang, S. L. (2024). Competing Explanations between Material and Ideational Structures: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of Chinese History.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0), pp. 89-182.]
- 歐陽修著，楊家駱主編（1998）。新五代史附十國春秋及綜合索引（一）。鼎文。[Ouyang, X. zhu, Yang, J. L. zhubian (1998a). *Xin wudai shi fu shiguo chunqiu ji zonghe suoyin (yi)*. Dingwen.]
- 盧胡彬（1999）。吳越國的精緻文化。復興學報，1999（12），頁 433-438。[Lu, H. B. (1999). The Refined Culture of the Wu-Yue Kingdom. *Fuxing Journal*, 1999 (12), pp. 433-438.]
- 錢 穆（1995）。國史大綱（上）。臺灣商務印書館。[Qian, M. (1995). *Guoshi dagang (shang)*.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 穆 靜（2010a）。論五代軍將女眷對軍政與時局的影響。浙江學刊，2010（3），頁 55-62。[Mu, J. (2010a). On the Influence of Female Family Members of Generals in the Five Dynasties on Politics and Military Affairs.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2010 (3), pp. 55-62.]
- 穆 靜（2010b）。論五代軍閥的養子之風——從軍政與時局角

- 度談起。華南理工大學學報，**2010**（12），頁 63-69。[Mu, J. (2010a). The Adoption Practice among Warlords of the Five Dynasties: A Discussion from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0 (12), pp. 63-69.]
- 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a）。新校本舊五代史并附編三種（一）。鼎文。[Xue, J. Z. zhu, Yang, J. L. zhubian (1977a). *Xin jiaoben jiu wudai shi bing fubian sanzong (yi)*. Dingwen.]
- 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b）。新校本舊五代史并附編三種（二）。鼎文。[Xue, J. Z. zhu, Yang, J. L. zhubian (1977b). *Xin jiaoben jiu wudai shi bing fubian sanzong (er)*. Dingwen.]
- 薛居正著，楊家駱主編（1977c）。新校本舊五代史并附編三種（三）。鼎文。[Xue, J. Z. zhu, Yang, J. L. zhubian (1977c). *Xin jiaoben jiu wudai shi bing fubian sanzong (san)*. Dingwen.]
- 韓啓超（2024）。五代十國之十國音樂考——兼論五代十國「多元一體」音樂文化格局的形成。民族藝術研究，**37**（3），頁 45-85。[Han, Q. C. (2024). Music of the Ten Kingdoms during the Period of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The Formation of the Music Culture Pattern of ‘Diversity in Un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Journal of Ethnic Arts Studies*, 37 (3), pp. 45-85.]
- 關棨勻（2017）。晚唐五代時期城防戰探索——兼論五代後唐滅梁戰爭的致勝因素。中華文史論叢，**2017**（1），頁 89-119。[Guan, Q. Y. (2017). An Exploration of City Defense Battles in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Winning Factors in the Later Tang’s War against Lia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Review*, 2017 (1), pp. 89-119.]
- 關棨勻（2021）。唐末五代十國時期的城市攻防戰。萬卷樓。[Guan,

- Q. Y. (2021). *Tangmo wudai shiguo shiqi de chengshi gongfang zhan*. Wanjuanlou.]
- Aksoy, D., Enamorado, T., & Yang, T. Z. (2024).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and Chinese Public Support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8 (2), pp. 341-360.
- Bengtsson, R. (2024). Complex Role Enactment Amid Global Value Contestatio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Order. In Panke, D. & Friedrichs, G. (E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mid Global Crises: Analysing Role Selection and Impact through Role Theory* (pp. 31-48).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 Calcara, A., Gilli, A., Gilli, M., & Zaccagnini, I. (2022). Will the Drone Always Get Through? Offensive Myths and Defensive Realities. *Security Studies*, 31 (5), pp. 791-825.
- Cederman, L. E., Pengl, Y. I., Girardin, L., & Müller-Crepon, C. (2024). The Future Is History: Restorative Nationalism and Conflict in Post-Napoleonic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8 (2), pp. 259-292.
- Damann, T. J., Kim, D., & Tavits, M. (2024). Women and Men Politicians' Response to War: Evidence from Ukrain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8 (2), pp. 321-340.
- Evangelista, M. (2024). A 'Nuclear Umbrella' for Ukraine? Precedents and Possibilities for Postwar Europe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8 (3), pp. 7-50.
- Ferraro, V. (2024). Why Russia Invaded Ukraine and How Wars Benefit Autocrats: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the Russo-Ukrainian Wa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5 (2), pp. 170-191.
- Freedman, L. (2014). Ukraine and the Art of Limited War. *Survival*, 56 (6), pp. 7-38.

- Freedman, L. (2023). The Russo-Ukrainian War and the Durability of Deterrence. *Survival*, 65 (6), pp. 7-36.
- Goldgeier, J. & Wojtowicz, L. (2022). Reassurance and Deterrence after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Security Studies*, 31 (4), pp. 736-743.
- Hale, H. E. & Lenton, A. C. (2024). Do Autocrats Need a Foreign Enemy? Evidence from Fortress Rus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9 (1), pp. 9-50.
- Hordiichuk, O. (2023). The Ideological and Ontological Causes of Russia's War on Ukraine. West versus East; Tyranny versus Democracy. *Ethics in Progress*, 14 (1), pp. 4-23.
- Iqbal, B. A. & Rahman, M. (2023). BRICS and India in the Light of Russia-Ukraine Crisis: Emerging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East Asia & International Law*, 16 (1), p. 159.
- Jones, P. (2023). Poland Becomes a Defense Colossus: Poland has Launched A Huge and Historic Expansion of Its Military. What Will the Consequences Be?. *Center for European Policy Analysis*, September 28. <https://cepa.org/article/poland-becomes-a-defense-colossus/>
- Kurnyshova, Y. (2023). How Russia's War Hi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Ukrainian Analytical Digest*, (2), pp. 6-7.
- Layne, C. (1993).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 (4), pp. 5-51.
- Lind, J. (2024). Back to Bipolarity: How China's Rise Transforme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9 (2), pp. 7-55.
- Mearsheimer, J. J. (1990).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1), pp. 5-56.
- Mearsheimer, J. J. (1993). The Case for a Ukrainian Nuclear Deterrent.

- Foreign Affairs*, 72 (3), pp. 50-66.
- Mearsheimer, J.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W.W. Norton & Company.
- Mearsheimer, J. J. (2014).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Foreign Affairs*, 93 (5), pp. 77-89.
- Miles, S. (2024). We All Fall Down: The Dismantling of the Warsaw Pact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8 (3), pp. 51-85.
- Monteiro, N. P. (2011). Unrest Assured: Why Unipolarity Is Not Peacefu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6 (3), pp. 9-40.
- Plokhly, S. (2023). *The Russo-Ukrainian War*. Penguin Books.
- Rathbun, B. C. & Pomeroy, C. (2022). See No Evil, Speak No Evil? Morality,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6 (3), pp. 656-689.
- Røren, P. (2023). The Belligerent Bear: Russia, Status Orders, an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7 (4), pp. 7-49.
- Ruhnau, O., Stiewe, C., Muessel, J., & Hirth, L. (2023). Natural Gas Savings in Germany during the 2022 Energy Crisis. *Nature Energy*, 8 (6), pp. 621-628.
- Stent, A. (2022). Germany and Russia: Farewell to Ostpolitik?. *Survival*, 64 (5), pp. 27-38.
- Talmadge, C., Michelini, L., & Narang, V. (2024). When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Adversary Perceptions of Nuclear No-First-Use Pledg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8 (4), pp. 7-46.
- Vlados, C. & Chatzinikolaou, D. (2024). Russo-Ukrainian War and the Emerging New Globaliz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Relevant Research. *The Japanese Political Economy*, 50 (1), pp. 91-113.
- Wagner, R. H. (1993). What was B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 (1), pp. 76-106.

Waltz, K. N. (1964). The Stability of a Bipolar World. *Daedalus*, 93 (3), pp. 881-909.

Waltz, K.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cGraw Hill.

Waltz, K. N. (1986).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Keohane, R. 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pp. 322-346).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 N. (1996).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6 (1), pp. 54-57.

Waltz, K. N.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1), pp. 5-41.

Waltz, K. N. (2004). Neorealism: Confusions and Criticisms.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15 (1), pp. 2-6.

Wang, G. W. (2007). *Divided China: Preparing for Reunification 883-947*.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Wendt, A. E.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hlforth, W. C. (1999).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1), pp. 5-41.

Material Structure Versus Ideational Structure: Historical Case Studies of the Stability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Period and their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Shih-yueh Yang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pands th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competing explanations between material and ideational structures and encourages more theoretical studies of systemic stability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llowing the study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period and examines the changes in material structures during those periods and explores the mainstream ideation popular at the time. It demonstrates how the argument that bipolar systems are relatively stable gained strong support during that period.

Keywords: Bipolar, Multipolar, Material Structure, Ideational Structur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